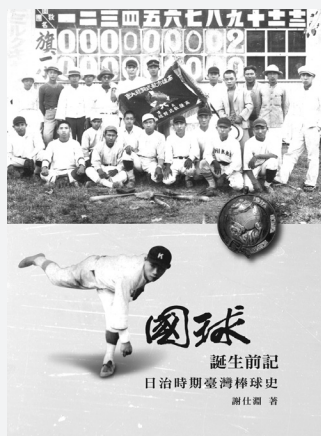


「國球」誕生前記：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史

翁稷安*



作者：謝仕淵

出版機關：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

ISBN：978-986-03-5865-0

出版日期：2012年12月

一、前言

在臺灣，棒球是屬於每個人的故事與回憶，是人們情感的寄託，走入每個人的生命；也因此才會出現視棒球為「國球」的說法。然而，就像許多日常生活既存的詞彙或事物，棒球作為「國球」似乎是理所當然的存在，多數人無意深究它的歷史和過去，這種欠缺歷史縱深的理解，成為臺灣棒運推動的限制之一。棒球和任何運動一樣，皆奠基於榮耀的傳承，不深入歷史之中，就無法找到那光榮的活水源頭，難以理解勝與敗之所以能牽動人心的脈絡糾葛，更難以理解為何總在棒運面臨一次又一次的困頓與打擊時，國人卻又願意給出一次又一次的原諒和機會。人無法預測未來，過去也不能見得必成明鑑，但唯有賦與歷史的視野和重量，我們才有可能去估算未來的距離，而非手無寸鐵任命運擺佈。臺灣的棒球，不乏針對當下賽事的書寫與評論，概論或介紹臺灣棒球的讀物也所在多有，唯一美中不足的，由專業學術訓練視角出發的臺灣棒球史研究，仍有努力的空間。

*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

謝仕淵所著，由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出版的《「國球」誕生前記：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史》，可說填補了這份缺憾。作者長期投身臺灣社會文化史的研究，體育史和棒球史為其專業，發表過〈殖民統治與身體政治：以日治初期臺灣公學校體操科為例（1895-1916）〉等論文數篇，¹ 與謝佳芬合著《臺灣棒球一百年》一書，² 編有口述史料《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口述訪談》，³ 並具有長期策展的實務經驗，是同時兼顧學術書寫與大眾對話的史學研究者。本書由其2011年的博士論文《帝國的體育運動與殖民地的現代性：日治時期台灣棒球運動的研究》改寫而成，這部厚達四百多頁的專著，不僅涵蓋日治時期臺灣棒球發展的各個層面，並且以課題化的角度進行論述，使全書跳脫了依照時序的平鋪直敘，深化了各種的研究可能，讓臺灣棒球史的研究成為理解日治時期，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錯綜複雜關係的重要切入。簡言之，本書不僅是難得的運動史專著，更是一本闡述日治時期臺灣社會文化發展的重要力作。

二、內容概述

全書除緒論、結論外，共有七章，分為上下兩篇，可區分為中央和民間兩種不同的歷史視角：上篇集中討論作為帝國殖民者的日本政府，如何利用官方的力量，在臺灣推動「日本化」後的棒球運動；下篇則將焦點置於臺灣民間社會，如何自發性去吸收、接納這項運動，成為臺灣常民文化的重要組成，從棒球之中開展出屬於自己的榮耀和傳統。

上篇「中央與邊陲、競爭與合作—帝國的體育運動」共分為三章，第一章〈臺灣體育協會與棒球行政體制〉，開宗明義地指出，日治時期臺灣體育行政的形成，目的是為了「統合島內」和「編入帝國」，棒球是其中重要項目，是帝國統治者治理的延伸和刻意的移植。無論前期具民間機構性質的北部野球協會，或1920年成立負責統攝全臺體育事務的臺灣體育協會。官方對體育的滲入與壟斷，成為臺灣棒運的重要特徵，並建立起仿造地方行政層級的金字塔結構，各層級的體育行政單位、賽事和選手，都必須服膺這樣的架構，於框架之中運行或找尋出路。

1 謝仕淵，〈殖民統治與身體政治：以日治初期臺灣公學校體操科為例（1895-1916）〉，收入若林正丈、吳密察主編，《跨界的臺灣史研究：與東亞史的交錯》（臺北：播種者文化，2004），頁271-312。

2 謝仕淵、謝佳芬合著，《臺灣棒球一百年》（臺北：果實，2003）。

3 謝仕淵編著，《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口述訪談》（臺南：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，2012）。

第二章〈殖民帝國棒球世界的構成〉則在說明日本政府移入臺灣的不僅是體育項目或行政體系，於殖民母國所蘊育轉化的運動精神也一併傳承給了被殖民者。十九世紀末棒球從美國傳入日本時，即和武士道相結合，發展出迥異於美國棒球重視個人主義、民主傳統和男性英雄崇拜等特質，形成了日式獨特的武士道棒球文化。甲子園大會（「全國中等學校優勝野球大會」的俗稱）的儀式與規範，是棒球與武士道結合具體化的關鍵，讓「武士道野球」的精神能被人民「看見」，有效推廣。透過甲子園賽事和「六大學」訪臺等活動，臺灣棒球也連結上了這份強調自我修練與犧牲、以榮耀大我為目的的武士道血脈。

在第三章〈「嘉農」棒球與「三民族」的運動競合〉中，以嘉義農林學校為對象，描繪在前述統治框架和精神傳承下，臺灣棒球選手與球隊實際的運作和處境。嘉農棒球的獲得重視，必須在殖民框架下加以理解，它符合了殖民者所期盼的族群融合，最著名的「三民族」（日、臺、原住民）融合，是逐漸被刻意突顯出來的，不斷宣傳嘉農成績和族群融合的關聯，呼應了同化政策的理念，然而其中仍隱含著對臺灣原住民「他者的身體想像」。嘉農的勝利觸碰到了臺灣最複雜的族群議題，並非殖民者所能單向的控制，透過嘉農與全日人球隊的嘉中對決，又或者當嘉農與嘉中前往甲子園的競賽，島上的自身認同正逐漸凝聚，難以析解的認同糾結與混亂，也在棒球賽事獲得了各方所能共同接受的平衡，成為島內融合與共識形成的契機。這也說明了單由統治者角度去理解臺灣棒運的侷限，開啟了本書下篇的論述。

在下篇「棒球運動與殖民地的現代性」共有四章，第四章〈臺灣人的體育運動觀〉，作者首先討論了臺灣人的體育觀，是如何由排斥到接納殖民者對運動的引入，從視身體健康為國家富強手段的大我論述，發展出臺灣人應以體育爭勝世界的企圖和自信。值得注意的，這樣的過程是伴隨現代性的移入所展開，形成了傳統和現代並列堆疊的重層化現象。新式體育運動的建立，是對傳統民俗競技的排除，而人民對棒球等新式運動的接受，是從反對、抗拒一步步被導引，最終發展出自身對體育、棒球的解釋和想像。漢詩社群對棒球的接納，乃至成為入詩題材，標誌著傳統社群對新式運動的完全接受，也顯現了運動的普及，甚至成為社交生活不可缺少的一環。

第五章〈棒球選手的身體技藝與自我認同〉，以1920年代的公學校少棒運動為分析對象，該運動經由和教育系統結合，由上而下，讓臺灣人有更多接觸棒球的機會，

進一步使棒球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。棒球運動中，對身體、技術的鍛練、對規則和秩序的服從，和團隊合作的追求等諸多價值也隨之層遞散佈。經由一場場的棒球賽事，各校乃至各地方之間，發展出「一體感」的自我認同；優勝旗和紀念章等物件，更成為凝聚記憶的物質象徵。然而，校與校的對抗，仍觸及了日本人與臺灣人之間族群的不平等與矛盾，是現實困境的投射，但因為棒球賽事相對而言還是安全的，故成為了殖民者所允許，讓被殖民者宣洩不滿的出口。

第六章〈軟式棒球與休閒活動〉，則指出1930年代，技術和資本門檻都較低的軟式棒球，成為校園之外推廣棒運的關鍵，吸引社會各界團體的參與，使得棒球成為人們公餘時的重要休閒娛樂，並建立起有組織的聯盟賽事，亦有相關的儀式和紀念物。軟式棒球也開啟臺灣棒運在官方主導下，另闢戰場的契機，高砂野球聯盟的成立，打破了日本人主導的棒球體制，相對於日本人可以透過各式管道參與棒球運動，高砂野球聯盟以較寬泛的條件，讓更多臺灣人能投入棒球運動，形成在官方管控下的自立表現，並讓參與者於享受棒球之中，各自尋求棒球對己身的生命意義。

第七章〈棒球的大眾化：廣播、報紙與棒球場〉則改由棒球相關週邊如大眾傳媒報導和場地等角度，去思考棒球於日治時期走向大眾的過程和意義。棒球能取得廣泛的社會基礎，臺灣傳播媒介的普及息息相關，在廣播、報紙等大眾媒體推波助瀾下，棒球逐漸走向大眾。親赴各大小新設立的球場看球，更是匯聚棒球文化的關鍵，球迷乃至球星的出現，顯示了棒球運動的成熟，隨著愛好棒球的人口增加，每個人投身或喜愛的理由各不相同，發展出各自的認同，殖民者所主導的理念，也日漸受到庶民文化的洗禮和詮釋，統治者無論在參與或論述的獨佔地位，也面臨了動搖的考驗。

在結論中，作者對日治時期棒球和日後棒運發展之間的承襲進行思考，指出絕非以單一的線性銜接或二元對立所能概括。戰後臺灣人取得棒球的主導權，卻也面對了棒球精神和實力的倒退，棒運對日本的依賴被突顯，然而在抗日的政治價值下，日本又是競爭的對手，成為既敵對又崇敬的複雜關係。1970年代臺灣進入「三冠王」時期，棒球重新受到國人的注目，成為人民現狀不安的出口和慰藉，情況和1930年代如出一轍，依舊是弱者奮鬥的情節，期待逆轉勝的產生，自傲與自卑交雜的結果，也讓人們傾向以速效的方式，獲取勝利，忽視了在物質或精神層面上的基本建設，造成了今日臺灣棒球的困境。許多改善的方法和提案，又再次出現日治時期棒球論述的影子，正說明理解日治時期臺灣棒球運動的重要。

三、觀點討論

通觀全書，本書的貢獻可大致分成兩個最主要的方面，首先就臺灣棒球史而言，這部紮實的專著，無疑填補了過往研究的不足，對日治時期臺灣棒球的研究多半仍限於單篇或學位論文的形式，或僅視作討論日治時期整體體育運動的一環。以專書的形式進行針對性的討論，賦與了本書在論述上足夠空間，對日治臺灣棒球的各個面向皆進行了深入的剖析，不僅填補許多史料與史事的空白，彌補多數人對這塊土地棒球發展的缺乏理解。

更重要的，本書勾勒出日治棒運推廣和發展的兩條主軸：殖民者的移植及被殖民者的接受，在「授／受」之間不只是由上而下的單向概括承受，臺灣民間的社會也在過程中，發展出自己的轉化與認同；在官方權力運作機制，找到自身「弱者的抵抗」。也因此形成了十分微妙的張力關係，尤其棒球的賽事往往會涉及日臺不同族群之間的勝負對抗，成為被壓抑的臺灣人合法的宣洩管道，變相成為帝國治理的緩衝，這或許是最初所始料未及的。然而這樣的宣洩管道是否真能舒散壓力，或只是更加確立起日臺之間人／我的對立，影響則難以估計。是以，當我們再回頭思考最初日本政府在台推動棒運的兩大目的：「統合島內」和「編入帝國」時，將發現兩者之間是充滿張力的，在凝聚島內共識很容易會成為對帝國的抵抗，但這樣的抵抗又被限制在規則章程的框架下，如作者所言「臺灣人在棒球運動中表現出成為生命共同體的團結精神，卻也在棒球中看見自我的弱小」（頁431），棒球運動在臺灣發展被烙印了如此矛盾的性格，若不是經由作者以深入的爬梳剔抉，這樣深層的意義實難顯現。

其次，就大眾文化史研究的角度而言，如論者所指出本書透過體育運動作為切入，對日本殖民統治進行理解，已為日後日治臺灣史研究開闢了一條新的文化史研究取向。⁴ 經由對棒球這個臺灣最重要的體育賽事和休閒文化的研究，本書的研究觸角幾乎涉及了運動史所能挖掘的各個意義層面，除了前段已約略提及視棒球為「外來現代性」微形縮影加以討論，其他如運動場域內權力的運作、族群之間的融合與想像、人與物之間的關係、集體記憶的構成、大眾傳播的重要、公共空間與輿論的形成……等等，不一而足。在研究方法的層面亦推陳出新，諸如大量使用口述歷史的資料，不

4 蔣竹山，〈棒球運動與殖民地臺灣：讀謝仕淵《國球誕生前記：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史》〉，人社東華，http://journal.ndhu.edu.tw/e_paper/e_paper_c.php?SID=15，2014/3/28。

僅填補文字史料的生硬與不足，並貼近棒球運動的實際，讓該書處處充滿感人的血肉；大量運用並探討球具、獎牌、紀念旗等物品，也提供從物質文化理解臺灣棒運的可能。總之，深刻的問題意識結合了史料的廣博與突破，讓理論和資料得已充分對話。這也連帶使得本書的研究展現了文化史研究所該有的高度，在文化史的風潮下，學界對於過往庶民文化中大小物品或文化現象有著高度的關注，讓人們能重新理解過去的生活樣貌，然而倘若研究僅停留在對這些物品或文化現象的描述，僅提供新奇的趣味而無法挖掘背後深刻的意義，回應大敘述的不足，難免予人遺憾，這些物品或文化現象應是進入歷史結構的起點而非終點，無論體育史或文化史的研究，本書都是十分良好的示範。

本書是企圖心十足的著作，也才能成就前述兩大貢獻。但也正因為規模如此龐大，會激起更多研究的可能，以下僅拋磚引玉提出三點。首先，為什麼是棒球？如本書所言，棒球是當時日本政府體育行政規劃的一項，其他運動如體操科亦透過校際競爭，培養各校的榮譽認同（頁22），⁵ 網球也獲得高度發展，贏取不亞於棒球的榮耀，⁶ 又或者像橄欖球和足球在當時也有一定程度的風行。⁷ 棒球為什麼最後能脫穎而出，經過近百年的時間，以及政權輪替之後，仍維持「國球」的地位，取得國民的認同？其解答可能有其偶然性，也可能涉及各類運動本身的特性及人為因素，無論如何，當我們對於日治時期的棒球發展有了如此詳細的了解後，將棒球和其他運動發展進行比較，或能挖掘出更多屬於棒球或臺灣社會的歷史意義。

其次，則是日本和臺灣社會的臍帶關係，本書已多所描繪，特別在精神層面的傳承上，從武士道文化所演化出來的棒球精神，已進入科學棒球時代的今天，在臺灣都仍見其影響。較美中不足的，這樣的討論僅限於棒球內在價值層面，和社會層面互動的討論較少。臺灣棒球的發展時期，正是日本大眾社會的成立期，迎來大量消費的時

5 關於體操科和殖民統治之間的關係，可參見前引〈殖民統治與身體政治：以日治初期臺灣公學校體操科為例（1895-1916）〉一文。

6 可參考林丁國，〈日治時期臺灣網球與棒球運動的島內外競賽表現〉，《臺灣史研究》16卷4期（2009，臺北），頁40-52。

7 橄欖球和足球的研究，和其流行程度成正比，研究甚少，多半由少數愛好者保存。橄欖球可見洪敦賓，〈橄欖球運動傳入台灣簡史〉，《臺灣體育》83期（1996，臺北），頁23-24。莊皓閔，〈府城啟動史——臺南市橄欖球運動發展過程之研究（1945-2010）〉（臺南：國立臺南大學體育學系碩士論文，2012）。日治時期的足球可參考久保，〈臺灣足球的百年浮沉（一）〉，TOKKA，http://tokka.cc/column_info.aspx?ID=1338，2014/3/28。

代，並確立文化的商品化，甚至有學者稱其發展出「新的人間類型」；⁸ 同時卻也是政壇變動最劇烈的時期，從大正民主演變成軍部獨裁。⁹ 反觀臺灣，棒球勃興的同時也陷入政治氣氛最低壓的沈悶，以「治安維持法」為依據，臺灣各種路線反殖民運動都受到嚴重的打擊。¹⁰ 如果能納入這樣的社會背景去看待臺灣的體育運動，必將能更立體化的呈現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授／受關係。

最後則是臺灣棒球運動若放在更廣大的架構去理解，比如在日本帝國的層次，不同殖民地之間如臺灣、朝鮮，乃至滿洲之間，在推行上是否有所差異，以及彼此之間的互動，「統合島內」和「編入帝國」之後，是否有進一步「統合帝國」的企圖或可能，也許是值得再進一步析理的課題。¹¹ 又譬如置於亞洲的整體角度思考，特別中日之間作為亞洲體壇最主要的競爭對手，雙方之間的差異，以及在一次次國際競賽後所取得的意義。譬如南京國民政府強調體育背後的「道德之表現」和「規律之遵守」，¹² 這中間和武士道運動精神的異同，再考慮到當時國際間瀰漫的法西斯主義，以及戰後兩種觀念於臺灣的銜接，這樣的比較是有其可能的意義和重要性。

當然，上述的問題並非本書主要旨趣所在，想像的研究可能和實務研究之間必有落差，然而也正是因為本書對臺灣日治棒球的發展，畫下深刻的理路，也才會刺激人們去追問，這正說明了本書的成功。臺灣棒球已有太多曇花一現的瞬間，如今出現一本如此堅實的基礎，不單只是填補人們知識版圖的空白，更為了未來無論運動史或文化史的研究，提供了充滿潛力的起點。

8 語出竹村民郎，關於此時期日本大眾文化的形成與意義，可參見氏著，林邦由譯，《大正文化：帝國日本的烏托邦時代》（臺北：玉山社，2010）。

9 可參見 野潤治著，鍾淑敏譯，《近代日本政治史》（臺北：五南圖書，2008），頁129-254。

10 陳芳明，〈「KANO」及八田與一〉，聯合新聞網，<http://udn.com/NEWS/OPINION/OPI4/8541874.shtml>，2014/3/28。這方面的研究很多，其梗概可參見周婉窈，《臺灣歷史圖說（增訂本）》（臺北：聯經，2009），頁182-186。陳翠蓮，《百年追求：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·卷一，自治的夢想》（臺北：遠足文化，2013），頁99-123。

11 這方面學界已有初步的嘗試，可參見林丁國，〈觀念、組織與實踐：日治時期臺灣體育運動之發展（1895-1937）〉（臺北：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，2009）。

12 褚民誼，〈全國運動會之真意義〉，《中央週刊》280期（1933，南京），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，《中央週報》（南京：南京出版社，1997），冊22，頁156-157。

引用文獻

1. 久保，〈臺灣足球的百年浮沉（一）〉，TOKKA，http://tokka.cc/column_info.aspx?ID=1338，2014/3/28。
2. 竹村民郎著，林邦由譯，《大正文化：帝國日本的烏托邦時代》。臺北：玉山社，2010。
3. 野濶治著，鍾淑敏譯，《近代日本政治史》。臺北：五南圖書，2010。
4. 周婉窈，《臺灣歷史圖說（增訂本）》。臺北：聯經，2009。
5. 林丁國，〈日治時期臺灣網球與棒球運動的島內外競賽表現〉，《臺灣史研究》16卷4期，2009，臺北，頁37-80。
6. 林丁國，〈觀念、組織與實踐：日治時期臺灣體育運動之發展（1895-1937）〉。臺北：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，2009。
7. 洪敦賓，〈橄欖球運動傳入台灣簡史〉，《臺灣體育》83期，1996，臺北，頁23-24。
8. 莊皓閔，〈府城啟動史——臺南市橄欖球運動發展過程之研究（1945-2010）〉。臺南：國立臺南大學體育學系碩士論文，2012。
9. 陳芳明，〈「KANO」及八田與一〉，聯合新聞網，<http://udn.com/NEWS/OPINION/OPI4/8541874.shtml>，2014/3/28。
10. 陳翠蓮，《百年追求：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·卷一，自治的夢想》。臺北：遠足文化，2013。
11. 褚民誼，〈全國運動會之真意義〉，《中央週刊》280期，1933，南京，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，《中央週報》。南京：南京出版社，1997，冊22，頁156-157。
12. 蔣竹山，〈棒球運動與殖民地臺灣：讀謝仕淵《國球誕生前記：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史》〉，人社東華，http://journal.ndhu.edu.tw/e_paper/e_paper_c.php?SID=15，2014/3/28。
13. 謝仕淵，〈殖民統治與身體政治：以日治初期臺灣公學校體操科為例（1895-1916）〉，收入若林正丈、吳密察主編，《跨界的臺灣史研究：與東亞史的交錯》。臺北：播種者文化，2004，頁271-312。
14. 謝仕淵，《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口述訪談》。臺南：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，2012。
15. 謝仕淵、謝佳芬，《台灣棒球一百年》。臺北：果實，2003。